



徐凤翔

年近 90 岁的徐凤翔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时踏上前往深山密林科考的路途了。但她仍保持着年轻时的习惯，睡眠极少，至凌晨仍不寐。后半夜醒来有时拿起报刊书籍翻翻看看，有时干脆什么都不做，任凭脑中思绪翻腾。从专业理念到名词概念，再到论述应如何遣词造句，她在脑中反复推敲。她说，自己一辈子爱“自我折腾”“跟自己较劲”。

这位曾在上世纪 80 年代因为作家黄宗英的报告文学《小木屋》而知名全国的森林生态、高原生态学家，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已是十分遥远和陌生了。

2019 年 5 月，徐凤翔出版了她的专业著作《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从思考到动笔，用了几年的时间。“这是我专业上的封笔之作。不写了，老了。”她说。

一心进藏

70 年前，徐凤翔与森林的相遇有个诗意的开始。

1950 年，因父亲中风卧床，徐凤翔没有考学，在家中照顾父亲。她是个闲不住的人，照顾父亲之余，常跑出来参加活动，或是到附近的新华书店看书。

一天，她在《中国林业》杂志创刊号上无意间读到了新中国首任林业部部长梁希的文章：“把河山装成锦绣，把大地绘成丹青，新中国的林业人同时也是新中国的艺术家……”心中一直有个文学梦的徐凤翔惊呆了，原来从事林业工作竟有着这样的诗意，从此由文转科，考入南京大学森林系。

毕业后，徐凤翔被分配到南京林学院任教。闲不住的“老毛病”又犯了，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外，她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野外考察上。从长白山林区的松涛，到闽北林区的密林……徐凤翔把中国东、南、北、中各大林区的主要线路、典型生态类型跑遍了个遍。唯一的遗憾是还没去过西藏。

很快，机会来了。

1967 年左右，南京林学院接到任务，要派三位工农兵学员去援藏。一时间学校里人人紧张，只有徐凤翔感到兴奋。

那个年代，进藏是件十分凶险的事，可能要送命。从徐凤翔后来的经历来看，塌方滑坡、蘑菇中毒、疟疾发作、蚂蟥叮咬、狼群围困……确实是险象环生。但那时和以后的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发布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是我在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儿童励志读物。”11 月 12 日，在北京科学中心举办的“品读科学家故事，感悟科学家精神”——“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首发式暨科学家传记绘本编创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说。

在韩启德看来，宣传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培育科学文化土壤，是时代交给我们的重大命题。“‘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以适合儿童的故事内容和绘画形式彰显中国科学家精神，融学术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立足实践讲好故事，让科学家精神真正有骨肉、有血脉、有情怀，让脱胎于实践的科学家精神最终归于实践。”

“共和国脊梁”科学家绘本丛书是国内首套权威、成体系的原创中国科学家传记绘本丛书，用生动的文字、严谨的史实和精美的绘图讲述了竺可桢、钱学森、何泽慧、吴征镒、刘东生、梁思礼、袁隆平、屠呦呦等 8 位中国科学家的故事。

丛书依托于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由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绘本研究专家、科学家、科学家家属或秘书组成顾问委员会及编委会为丛书把关，由采集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张黎及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任福君担任主编，联合采集工程学术团队研究者创作文稿，国内新锐插画师创作绘图。本丛书已入选 2019 年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在分享丛书的策划初衷及创作历程时，张黎说，以科学史研究者为主的作者队伍，对科学家颇有研究，治学严谨，能做到不夸大、不渲染，实事求是地讲述科学家的故事。如何在确保科学性的前提下，保证趣味性与艺术性，让科学史研究者写出孩子们能听得懂的科学故事，是做原创科学家传记绘本精品必经之路。（张文静）

“咕叽教授”徐凤翔

■本报记者 张文静



《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徐凤翔著，王剑、高晓花整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5 月出版

东南建一座森林生态定位站。生活中的徐凤翔又“笨”得可爱，切葱花要问“切成零点儿厘米”；用茶壶煮夹生饭，干到挖不出来。

在野外，徐凤翔半夜里被一只草虱叮了肩膀，到了早上才叫黄宗英用烟头把草虱烫出来，因为前一晚“我看你累了”。把草虱拿出来后，顾不上穿好衣服，徐凤翔惊呼：“你看它的嘴，是刺吸式口器。问一问朱老师，要不要这完整的草虱标本。”惹得黄宗英连连感叹：“唉，没治！”

1985 年，经过多方吁请，54 岁的徐凤翔正式调藏，从此扎根高原。她的“小木屋”也从纸上变成了现实——高原生态研究所创立了。这座集办公、住宿、观测、育苗于一体的“科学小庙”，被她亲切地称为“高原小木屋”。

“庙”虽小，作用却大，这是我国高原生态研究的摇篮。爱人范自强利用假期赴藏，帮助研究所设计建设了分析实验室。徐凤翔在所内建起了常年定位站，还在农牧学院和色季拉山的东坡上设立了观测点，常年开展森林生态定位研究、观测、采集了林分生长、冠层径流、地表植物等科学数据。

徐凤翔带领团队进行野外考察，获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数据、标本和图像资料。他们对西藏的主要生态类型，特别是森林类型的生物组合、结构和生长、分布规律、资源价值、保护利用方法等，进行了系统的调查分析，创立了西藏森林生态学，并推动了林芝云杉林、巨柏林、墨脱林区生态与珍稀物种等西藏多个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1995 年，“超期服役”的徐凤翔退休，离开了高原。“闲不住”的她没有选择颐养天年，而是登上了被她称为“北京的珠穆朗玛”的灵山，建立起第二座“小木屋”。

1995 年，北京灵山生态研究所成立。这里设有中国高原纵览展室、灵山生物多样性展室、生态教学楼等，成为了“独特的生态科教园地”。徐凤翔和她的“小木屋”，分别获得我国的环保大奖——“地球奖”。

六字人生

徐凤翔说，《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出版后，她不再出版专业著作，明年可能会出版一本关于感谢的书。“不写了，老了。”“老了”这个词，不像是从徐凤翔口中说出的话。

1931 年出生的徐凤翔，已经 88 岁了。这

个满头白发、身材瘦小的老太太，步履矫健、神采飞扬，说起话来条理清晰、底气十足。

一直到去年，她还进藏，回到让她魂牵梦绕的“高原小木屋”去看了看。在此之前，已过古稀之年的她足迹踏遍了五大洲，进行生态观光，并与我国青藏高原进行对比考察。2015 年，84 岁的徐凤翔还飞到大洋洲，高兴地在塔斯马尼亚岛见到了温性雨林。

步履不停，思考亦不停。从任教南京林学院时对国内各大林区的科考，到对西藏高原生态的考察与思考，再到行至五大洲的考察经历和感悟，徐凤翔将这 60 年的经历写进了《绿野行踪——林海高原六十载》一书中。书中虽有不少有趣的科考故事，但核心仍是关于森林生态和高原生态的专业知识和理念。

“我总希望能多谈谈专业认识。”满头华发的徐凤翔对科研的执着一如从前。她把自己北京和南京的家都改造成了青藏高原生态“展览馆”，陈列她几十年来在西藏采集的珍贵图文资料；她接受邀请，到学校、博物馆作讲座；她笔耕不辍，出版了多部著作。一有机会，她就要讲对高原林区的研究与保护有多重要。

“高原林区是西藏的核心，是我国西南大林区的高原与后院，是全球高山森林大系统中拥有植被带谱最完整、类型最丰富、生境最优异、珍稀物种最独特的宝地。是全球生态制高点，需要更多关注和保护。”

“符合自然界演替规律与人类社会需要的生态关系是协调关系。因而‘生态平衡’一词不够准确，用‘生态协调’更好。”

“藏北不是无人区，而是少人区，是坚韧生命的活动区。”

“珍稀濒危物种，珍、稀、濒、危四个方面的分门别类、定性、定量需要更细致，不能笼统划分。”

说起专业问题来，徐凤翔思路清晰、滔滔不绝。“我不是大科学家，我只是个声音微弱的鼓吹手，或者说是个‘祥林嫂’？”她自嘲说。她说自己的一生就是在持续地“行（旅行）、观（观察）、学（学习）、思（思考）、交（交流）、保（环保）”，希望有更多人认识、关注、研究和保护青藏高原的生态。

这样的徐凤翔，一如黄宗英在 1982 年到西藏寻找她时听闻的那样：

“你认识徐凤翔吗？”我到处问。

“你问的是咕叽咕叽吧？”有人答。

“咕叽咕叽？”我疑惑地。

“是那位年过半百的女同志吧？”

“是过半了吧，1979 年，她 48 岁，可是像个少先队辅导员，戴着个小白帽。”

“是她，年年来，到处咕叽咕叽，人家叫她‘咕叽教授’。”

“她怎么啦？”我以为她得了个不雅的称号。

“咕叽，就是藏话‘求求’的意思，咕叽个‘熊掌牌’——就是在路边伸手拦车求捐脚；咕叽吃顿饭、借个宿；咕叽捎带标本；还从这个部到那个部咕叽建个什么站……”

“咕叽教授”——徐凤翔究竟在哪儿？

有人说：“听说她去了下察隅。”

“上个月，在樟木口岸看见她。”

“看见她在尼泊尔边境，傻看对岸的森林。”

书后

余贻鑫：厘清智能电网的基本理念

■范运年

能源互联网，是现在能源领域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是离开智能电网讲能源互联网，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什么是智能电网？智能电网由哪些部分组成？智能电网有哪些关键技术和挑战？

市面上有很多讲智能电网的图书，不乏优秀之作，但作为一个负责能源动力领域的科技编辑，我一直想出一本书，它能够讲清楚：到底智能电网是什么。

说清楚一项技术、一个名词是很难的事情，我和一些电力领域内的专家交流，有老师向我推荐天津大学余贻鑫院士。

余贻鑫院士十多年前就进入智能电网领域，是中国最早研究智能电网技术的专家之一，是中国智能电网领域的先行者和践行者。

2013 年，我很冒昧地给余院士发邮件，表达想去拜访的愿望，当面请教智能电网方面的一些知识，为组稿工作提供一些思路。

没想到第二天，余院士就给了肯定的答复。

当时，余院士已年近八旬，但一点也看不出。我们向余院士请教他对智能电网的看法，他认为，智能电网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涉及许多基本理念，而在国内智能电网认识上的混乱恰恰发生在基本理念上。

但他并没有马上应允约稿，余院士表示，虽然自己做了很多年智能电网相关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依托天津大学智能电网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承担了很多项目和课题，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撰写一本书还很难，应该再多等几年。

我们愿意等。

接下来的几年，我一直和余院士保持联系，余院士有时候也会提起这本书的构思进度，比如这几年智能电网的发展速度更快了，有一些更新的技术进展



《智能电网基本理念与关键技术》，余贻鑫著，科学出版社 2019 年 5 月出版

和理念的更替。

2017 年上半年，我又一次遇到了余院士。恰好，余院士的大会主旨报告题目就是“智能电网的分布式体系和群集理念”。

我再一次跟余院士提起 4 年前希望出版的书，这次他说已经考虑得差不多，可以开始写了，书名就定为《智能电网基本理念与关键技术》。

我曾经跟余院士建议，是否可以书名改为《智能电网理论与技术》。余院士认为不妥，他说，厘清智能电网的基本理念对于科学有效地实施智能电网至关重要，而智能电网的理论尚在继续发展完善中，这本书也只是概括他本人到目前为止对智能

电网基本理念的理解。后来，这句话被用在“前言”的第一句话，开宗明义地告诉读者写这本书的初衷和目的。

用心写一本书和写一本书，是有区别的。

余院士是在用心写一本书。他在 2017 年底便已经完成初稿，其后几个月数易其稿。尤其对书稿中的数据，余院士带领团队的人员逐一验证核实，能够获取最新数据的都力求更新数据，就算是团队发表的论文，也都根据最新的模型和数据重新绘制图表。

余院士为了这本书内容的完善，对书稿的细节细致到近乎苛求，以至于《智能电网基本理念与关键技术》一书的编辑修改过程，比其他的书过程长了许多。

我国分布式能源和新能源应用发展太快，各项新技术应用的数据一直在更新，每次我们修改完一个校次，余院士都会对书稿中的一些数据和模拟图形进行修改，力求把最新的成果展现给读者。在最后一个校次，余院士还是不放心的，提出还要再看一遍，看看我们之前的修改是否都已经正确无误地反映到书稿上，不能在修改的过程中出现新的错误。

《智能电网基本理念与关键技术》这本书，从酝酿策划到最终出版，于我而言是花了六年多的时间，而对于作者而言，研究智能电网远远不止六年，甚至超过十六年，是中国第一批研究智能电网的学者十多年的心得凝成的一本书。

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只是余院士对于智能电网研究的一个节点心得，正如“前言”中所说的，只是概括他本人到目前为止对智能电网基本理念的理解，未来可期，随着智能电网理论和应用的进一步发展，作者还会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将会继续和读者分享。

（作者系科学出版社编辑）

荐书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伍连德著，程光胜、马学博译，王丽凤校，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 年 4 月出版

伍连德是我国现代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现代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1910 年至 1911 年之间，他临危受命，负责组织扑灭在东北暴发的鼠疫大流行。1911 年 4 月，由伍连德主持的“万国鼠疫研究会”的国际医学学术会议在沈阳召开。

不过，伍连德早在 1937 年就返回了出生地马来亚，又因各种原因，他的名字后来逐渐被国人遗忘。

《鼠疫斗士——伍连德自述》这部自传是伍连德晚年所写，1959 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在回顾和总结自己近 80 年的人生历程的同时，伍连德以一位海外华人的视角，描绘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世界、南洋和中国的方方面面。

但此书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被完整地翻译成中文。2009 年“20 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编委会邀请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程光胜等翻译此书。该书获第七届吴大猷科普著作类翻译类银奖。



《耶稣的学生时代》，南非 J.M.库切著，杨向荣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9 年 7 月出版

“如果你乘一条船穿越大海，你的记忆会全部被洗干净，开始全新的生活。就是这么回事，不存在以前，没有历史。那条船在港湾码头停靠，我们从船的跳板上爬下去，然后就被扔进这里，来到此时此地，时间从此开始。”

本书是《耶稣的童年》的续篇。男孩大卫和他的“父母”西蒙、伊内斯为逃离诺维拉的教育制度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作为“逃犯”的他们在这里必须隐姓埋名。

大卫需要上一所新学校，于是进入了埃斯特雷拉的舞蹈学校，这里的教学方法颇为匪夷所思——校长夫人，也就是舞蹈老师，指导学生们通过跳舞把数字从星星上召唤下来。

毫无预兆地，一桩谋杀事件降落在校长夫人身上，而谋杀背后的故事比学校的教学方式更为耐人寻味……



《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蔡玉萍、彭翎、罗鸣、彭翎、彭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年 7 月出版

本书通过对中国深圳、东莞和广州 266 名农民工的深度访谈，描述了中国的城乡迁移对家庭和性别关系的改变。而这一探讨，是通过聚焦于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改变来完成的。

作者在书中展示了这场始于 30 多年前的规模城乡迁移，是如何重塑男性农民工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和儿子的角色的。在这场为了生计的“搏斗”中，男性农民工作出了“男性气质的妥协”：他们通过在夫妻权力和家务分工中作出让步、重新定义孝顺和父职等方式，努力维护家庭中的性别界限和他们在家庭中的象征性的支配地位。这些男性农民工及其家庭的故事，也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另一个侧面。

本书荣获国际社会学协会移民研究 2018 年度最佳图书奖。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德萨沙·斯坦尼西奇著，韩瑞译，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 7 月出版

本书作者萨沙·斯坦尼西奇荣获 2019 年德国图书奖。小说初版于 2014 年，获得当年莱比锡书展大奖，凭借此书，作者在德语文坛散发出特殊而耀眼的光芒。

斯坦尼西奇 1978 年出生于波斯尼亚小城舍格勒，1992 年，在波斯尼亚战乱中，14 岁的他与父母亲逃亡到德国海德堡，从此定居德国，以德语写作。

故乡记忆和移民经验是斯坦尼西奇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也奠定了他作品中天然的跨文化视角。在这部小说中，斯坦尼西奇将焦点定格在一个德国东部村庄日期前夕的 24 小时以内，通过深度挖掘传说故事、精准描摹村民的生存镜像，试图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关联脉络，并追问更宏大的文化融合问题。（喜平）